

孙郁系列

我们中国人，是惯常以独特的方式打量他人的，似乎虚空中，什么都不存在，而这非但不存在，正恰恰是所形成的。周作人于我，一方面在学识上基本参照，现代以来，像他那样博览群书的人，十分少见。另一方面，他的字常人的奇诡，散漫后的奇诡，止于生，参差的美感，似乎那周，也就着我，任人的心影。中国的读书后，有许多能他在古与乐，明与暗，间，内心感应的，就有周作人式的清静。虽然这一清静，隐隐地透着灰色，但能于寂寞间自立的寂寞，恰是寂寞文人的原形。

周作人左右



Zhouzuoren Zuoyou

孙郁 著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孙郁系列

Zhouzuoren Zuoyou

孙郁 著

周作人左右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作人左右/孙郁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ISBN 978 - 7 - 221 - 08435 - 4

I. 周… II. 孙… III. 文化—名人—人物研究—
中国—现代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6257 号

周作人左右

作者:孙 郁

责任编辑:杜培斌 孟豫筑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550004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刷:贵阳天济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字数:158 千

印张:15.5

版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8000 册

书号:ISBN 978 - 7 - 221 - 08435 - 4/K · 1080

定价:29.80 元

序

苦雨斋是周作人书房的名字。上世纪20至30年代,以周作人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他们既迥异于以鲁迅为旗帜的左翼知识分子,也不同于以胡适为代表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书以随笔形式,并辅之以百余幅图片,自由、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这一文人群体的文化心理、价值选择、人生姿态和社会取向。

这一本书酝酿的时间已很久了,但下笔的时候,就迟疑起来。要写的人物,是那么异类,用传统的视角不行,但换了新法,又常常不得要领。在中国,写一个“叛徒”,是冒险的事,类似的,书,不正受到种种指责么?所以,几年来,我时断时续,观点呢,似乎也在渐渐修改,内心的冲突,从未断过。

但我终于还是鼓足了勇气,想将自己的思绪,长久地沉浸在这个人的世界里。我们中国人,是愿意以纯粹的方式打量他人的,似乎眼中,揉不得杂色。而这个世界,正是以杂色构成的。周作人之于我,一方面在学识上是个参照,现代以来,像他那样博览群书的人,十分少见。另一方面,他的逆于常人的空漠,散淡后的绝望,让我产生了熟悉的感觉,似乎那里,也映着我们这代人的某些影子。中国的读书人,有许多徘徊在苦与乐、明与暗之间,内心流动的,就有周作人式的情调。虽然这一情调隐隐地含着灰色,但那不经意间闪动的意绪,恰好写着文人的宿命。

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思想界是禁谈他的名字的,原因自然复杂得很,这里主要遇到了道德问题。后来思想解禁,周作人忽地又热了起来,其出版物,从历史的封尘里走了出来。我自己,也正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这个远去的灵魂有了交流的机会。那时我还在鲁迅博物馆工作,接触到《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心里为之一亮,好似久违了的朋友,在那温馨的文字里,感到了悠长的亲情。我体味到了另一种情感,它像宁静的湖面涌动的波纹,给人浑朴的力量。我发现了自己和他的某种共鸣,他的文字唤起了我的一种长眠的情感,这些本应流出的情愫,不知为何从未开启过。那时我暗暗地感谢着他,如果不是读了这类文字,我还不会发觉自己存在着非冲动的、岑寂的审美偏好。实在地说,周氏提供给人的享受远不及鲁迅,倒是他的智慧表达式,那种不露声色的情感的喷吐,使我看到了近半个世纪中国文化的某种缺失。而周氏的价值,或许正在这里。

在随后陆续地读解他的作品时,我对其精神的认识也慢慢地发生着变化。我感到了他内心的冲突、焦虑,以及思想的不能自我圆通。和过于的自我,以至于在“为己”与“为人”间的选择里,常常倾向于前者。他与鲁迅的反差,映出了他精神的原色,而这一色调对于血性的青年而言,是充满了暮色的。周作人在文坛的寂寞,实属必然。

由周作人出发,上溯历史,寻找中国文人的另一条精神脉络,对我而言是个诱惑。他与自己的友人和学生形成的文化沙龙,对今人都无不具有文化史的意义。苦雨斋之于现代中国,好像是一个异类的存在,它的孤僻、陌生、远离烟火,至今还受到蔑视。但现代史上悲剧的缘由,却被苦雨斋里的文人们,多少预示到了。那个沙龙里的忧患、内省,以及自得其乐,与中国的活的人生,其实也是大有关联的。

在被喻为边缘化的知识群落里,苦雨斋的影子是浓厚的。喜欢性灵小品者,是那么众多。我在张中行、钟叔河、邓云乡、舒芜那里,都能感到周氏的遗韵。周作人对读书人的影响是内在的,你读一读黄裳,难道看不到知堂的情调?在董桥、谷林等人的身上,也有“文抄公”的神采吧?钱锺书在文字中,多少讥笑过周氏的文风,但我读他的《管锥编》,好似也能找到两人相近的地方。现代以来,倘论及读书札记类的写作,都不由地要谈到苦雨斋主人。这很类似章太炎之于学术,鲁迅之于小说。在文化的深层结构里,他们给后人的暗示,是不能小视的。

苦雨斋这个知识群落,在文本上留下的话题是众多的。我读俞平伯、废名的文字,以及晚明以来的野史、札记,感到其间有一种起伏不断的流脉,而周作人,大概就是这个流脉里的最重要的人物。中国文化中,“载道”派的写作与“言志派”的创作一直并行不悖。但到明清两代,旧路已死,文人要在文章中翻出新意,已经大难。“五四”以后,有了新式散文,面貌才为之一新。远离道统,近于心灵,很类似于诗词、小令,或择古人意绪之支脉,或以西域思想指陈人间,以性灵为本,缓缓流来。有一点知识,一点品位,一点兴趣,后人谓之书话,或讥为小品。这其间,周作人的影响,不可漠视。鲁迅而外,能在小品文上自成一家,且影响深远者,现在难见了。

但周作人之于后来的文化,还不仅仅是一种文体、学识的问题,那其间的文化苦境,谁能说不是一种预言?20世纪的中国,“革命”情结无所不在,而“革命”之外的文化母题,又有谁在思考?周氏于乱世之中,寻到一块自己的园地,由激进而中庸,由中庸而绝望,走的是另一条苦路。本欲绕开绝境,但却陷于绝境里,我们于此,当能警觉些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说,走进这个人的世界,会很有意味。我在目前的文人那里,很难遇到这类的存在。我曾说过,“五四”以来的散文家和学问家,值得久久打量的,惟有周氏兄弟。那是很难得的精神实体,它矗立在那儿,给着后人以漫长的回味。在历史的尘埃渐渐落定的今天,静静地打量这远逝的灵魂,会别是一番滋味吧。

目录

八道湾十一号	1
京派营垒	6
狂士	10
真人	14
“鬼谷子”	19
老友	22
同路者	26
聪明人	30
弟子之一	33
弟子之二	37
弟子之三	43
弟子之四	46
京派将领	50
南国真人	54
一点涟漪	57

绍兴帮?	60
聚会的场所	63
书肆之乐	67
六朝之风	71
平淡的文章	74
鉴赏家们	77
生活点滴	80
苦海	84
身边杂调	87
儒林内外	90
自己的文章	92
若远若近	95
友人之情	98
风俗研究	101
禁书问题	104

校园情调	107
看人的态度	110
北京的看客	113
激进主义	116
读书得怨	120
报刊文章	123
职业之忧	126
花鸟草虫	129
游戏与哲学	132
批评家言	135
旧道德化的生活	138
不革命	141
一厢情愿	144
翻译家	147
学问之道	151
明朝遗趣	154
伪高雅乎	157
学人的做作	161
语言的守旧者	163
两种冲突	166
杂诗杂调	170

文章之道	173
日记里的人生	176
模糊的面孔	180
“遇狼”的惊恐	183
谈吃之余	186
非道学	189
性心理学	191
女人的尊严	193
笑谈胡适	196
顾随的眼光	200
疯子的文学	205
苦茶庵里的笑话	208
下地狱	211
落水之后	215
苦路人生	218
翻案之心	221
知音者	224
晚年心境	227
苦雨斋余影	231
后记	241

八道湾十一号

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是一处面积约四亩的大宅院。1919年7月，鲁迅以三千五百元购下了此宅，同年底，鲁迅的母亲、夫人朱安，周作人、周建人及家眷陆续搬至于此。

这是鲁迅在北京住得最长的私宅，也留下了诸多可以感怀的故事。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故乡》以及第一本小说集《呐喊》诞生于此，他的译文集《桃色的云》、《工人绥惠略夫》、《爱罗先珂童话集》，及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上卷，也在这里完成。但1923年8月，鲁迅和周作人失和，搬出了八道湾，直到1967年周作人去世，八道湾十一号院的主人，一直是周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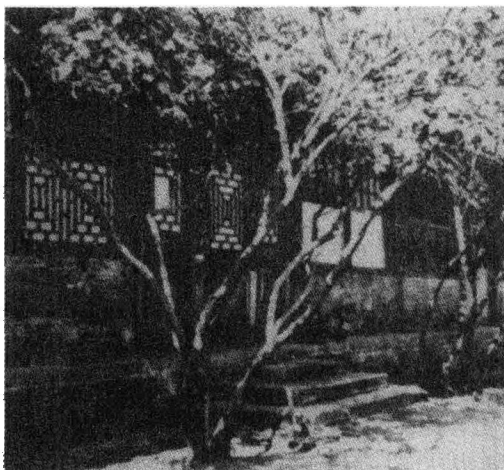
周作人生于1885年1月16日，比鲁迅小4岁，初名櫟寿，字星杓，他后来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改名作人，一直沿袭到老。他的笔名颇多，尤以知堂、启明（亦作“岂明”）等知名，所以世人也每每称之知堂老人。又因为是鲁迅的胞弟，排行老二，遂又有周二先生之称。

大概是上世纪20年代中期吧，周作人常称自己的书房为苦雨斋，这个名字在文坛渐渐响了起来。查俞平伯、钱玄同等人日记，苦雨斋出现的频率颇高，几乎成了八道湾的代名词。周作人自己也戏称是苦雨斋老人、苦雨翁等。

之所以将此取名为苦雨斋，乃是因为周作人住的小院地势过低，每逢下雨，积水难排。1924年，周作人在《苦雨》一文中，曾有过解释：

“我住在北京，遇见这几天雨，却叫我十分难过。北京向来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构造，于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实垛砖墙，大抵只用泥墙抹灰敷衍了事……”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里不知醒了几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喇哗喇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听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得很不痛快。还有一层,前天晚间据小孩们报告,前面院子里的积水已经离台阶不及一寸,夜里听着雨声,心里胡里糊涂地总是想水已上了台阶,浸入西边的书房里了……”^①



八道湾十一号

苦雨斋系周作人读书写作的地方。那间房子原为鲁迅住所,很有一些情调。周作人后来会客,一般都在此处。从1920年至1945年,造访过这里的文人颇多。查鲁迅、周作人日记,人员有宋紫佩、许季上、齐寿山、孙伏园、张凤举、萧友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郁达夫、徐志摩、胡适、许钦文、马裕藻等。此外,川岛、江绍原、俄国诗人爱罗先珂,也曾住在这里。鲁迅离开八道湾后,那里仍是友人聚会的场所。1924年元旦,到周宅的客人有:马幼渔、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徐祖正等;1925年元旦聚会者是:钱玄同、马幼渔、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陶晶孙、川岛、孙伏园等。直到上世纪30年代,到周宅者,大抵这些人物,关系较密的,又多了废名、俞平伯、江绍原、沈启无等。气氛较之先前,没有多大差别。除了元旦的大聚会外,每月还有零星的小聚,地点也大多在八道湾。自从周作人将此处称为苦雨斋后,它几乎成了沙龙的代名词了。

1926年,在为《狂言十番》写的序言之后,周作人的笔下出现了苦雨斋字样。此后写文通信,落款或为“苦雨翁”或为“苦茶庵”。一个“苦”字,外化着作者的心境,那里也隐含着作者的无奈吧。中国的隐士和遗民,常爱在诗文中用“苦雨”这类意象。晚明的伯子《与李咸斋》云:“苦雨连旬,云生窗户,岩溜噪耳欲聋。”晚清的罗振玉1916年2月6日在致王国维信中说:“今日苦雨而无风,不知舟行如何。”文人们

喜谈“苦雨”，正像吟风弄月，不过心绪的闪光，难说有什么独特的深意，只不过于此可感受到别样的情调而已。周作人后来以“苦雨翁”自娱，其实也有点笔墨游戏的意味儿，书信、文章之后的署名，也印有他性格的一面。这与他的文章内蕴，还是相吻的。

往来苦雨斋的人物，大多是京派文人，趣味、爱好相似，又多不谙政治，是一些颇有学识的人。这里的核心人物是周作人，其次为钱玄同。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为三兄弟，刘半农、马幼渔等是平辈的，俞平伯、废名等，则对上述诸人，执弟子礼。不过他们并无精神的界限，彼此以友人称之。说其系挚友，原也对的。除江绍原等极少数人有留学美国的文化背景外，众人大多留学过日本，或求学于北大、燕大，东方气息很盛。与胡适那个圈子，和后来金岳霖、林徽因那个圈子比，格调是不同的。这个沙龙的文化情调，无论在左翼文人眼里，还是西洋学堂毕业的人眼里，均有些格格不入。他们讨论的问题，研究的对象，至今在学术界还是清冷之学。



1912年在绍兴与家人合影

(前排中为母亲，右为妻羽太信子抱子丰一，左为妻妹羽太芳子，后排左为弟建人，右为作人)



八道湾十一号

八道湾十一号院是个清幽之所。谢兴尧在《回忆知堂》一文中，曾这样描绘过对它的印象：

“周的住宅，我很欣赏，没有丝毫朱门大宅的气息，颇富野趣，特别是夏天，地处偏僻，远离市廛，庭院寂静，高树蝉鸣，天气虽热，感觉清爽。进

入室内,知堂总是递一纸扇,乃日本式的由竹丝编排,糊以棉纸,轻而适用,再递苦茶一杯,消暑解渴,确是隐士清谈之所,绝非庸俗扰攘之地。”^②

后来结识过周氏者,对苦雨斋有各种各样的描述,任访秋、李霁野、张中行、文洁若、邓云乡等,都从其间感到了别样的气息。看文人对八道湾的追忆,多有一种神往的感觉,其间的话题,多种多样,内涵不一。苦雨斋是个难以说清的存在,惟其如此,才引来各种人的复杂的评说。我有时翻阅周氏兄弟的著作,以及同代人的书信、日记,不禁有种走进其中的渴望。但往往不得要领,好似隔膜着,看不清其中的面目。可是我们倘欲了解中国现代文化史,又不得不在这里驻足。“五四”之后中国的文化史,有许多是与此紧密相关的。

在一个深冬里,我和一位友人造访了西城区的八道湾。那一天北京下着雪,四处是白白的。八道湾破破烂烂,已不复有当年的情景。它像一处废弃的旧宅,在雪中默默地睡着。那一刻我有了描述它的冲动。可是却又有着莫明的哀凉。这哀凉一直伴着我,似乎成了一道长影。我知道,在回溯历史的时候,人都不会怎么轻松。我们今天,也常常生活在前人的背影下。有什么办法呢?

注:

①《雨天的书·苦雨》。

②《闲话周作人》29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鲁迅离开八道湾后，到那里造访的客人一般也与鲁迅有些来往。其实像钱玄同、刘半农、川岛、张凤举、徐祖正、沈尹默、沈士远、沈兼士等，既是周作人的友人，也是鲁迅的朋友。但是后来，鲁迅与他们中的一些人越来越隔膜，变得生冷起来了。这生冷的原因，一是周作人等人和激进的文化有了冲突，不喜左翼的腔调。另一方面呢，他们渐离生活，迷恋学术，颇有些象牙塔气了。先前，周作人还和“现代评论派”正面对峙，很有点斗士气，但后来却温和起来，像胡适、徐志摩也成了苦雨斋中的贵客，鲁迅对此是警觉的。1929年8月17日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说：

“我看，现代派诸公，是已经和北平诸公之一部分结合起来了。这是不大好的。有什么办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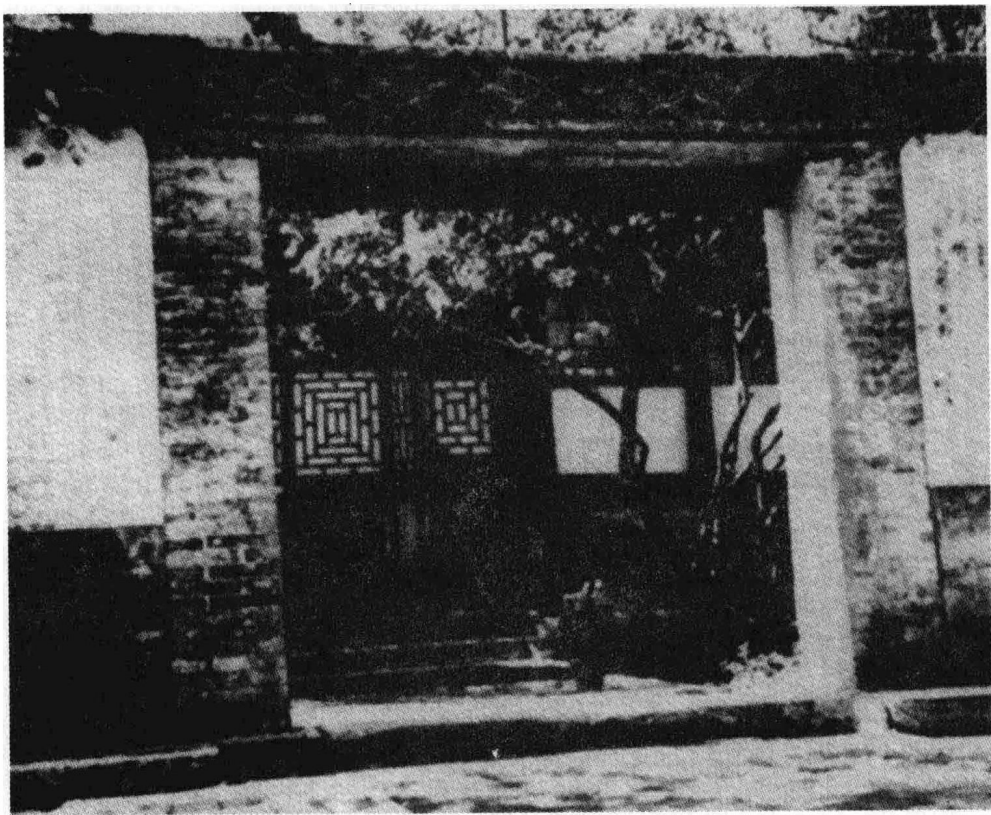
鲁迅的推测，有一半是对的，即周作人等，已不再与“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相对立，且成了他们中一些人的朋友。可是另一方面，苦雨斋的沙龙，还依然保持了“五四”初期的纯净之气，未被时尚气息所传染，这些，鲁迅大概忽略了。

沈尹默有一篇文章，回忆过八道湾聚会的盛况，真是让人感动。这氛围一直持续了多年，给京派文人，以不小的兴奋。苦雨斋的客人们多自由、洒脱之状，或狂狷如钱玄同者，或古怪深厚如废名者，风格各有不同。每次聚会，谈话的内容颇广，有讥时之调，亦多学术切磋。那些谈天的内容，有时在他们自办的《语丝》上刊出，很有名士之风。刘半农在巴黎的时候，看到周作人寄来的《语丝》，对苦雨斋的友人们竟生出神往的幽情。他在寄周氏的信中不胜感怀：

“你寄给我的《语丝》，真是应时妙品。我因为不久就回国，心目中的故乡风物，都渐渐的愈逼愈近了……启明的温文尔雅，玄同的激昂慷慨，尹默的大棉鞋与厚眼镜，什么人的什么，什么人的什么……

我希望回国之后，处于你们的中间，能使我文学的兴趣，多多兴奋一些。”^①

刘半农后来，真的成了苦雨斋中的常客。大凡到过八道湾的，对那里都有较浓的印象。像废名、俞平伯、沈启无、江绍原等，将苦雨斋视为生命之所，这些从书信之中，多少可以看到。苦雨斋里的人，彼此有点师承关系。如：周氏、钱玄同、沈兼士等，系章太炎弟子；俞平伯、废名、沈启无、江绍原则系周作人的学生。而俞平伯的曾



八道湾十一号

祖父俞曲园,又是章太炎的老师。这个关系,颇为有趣,也带有传统士大夫的痕迹吧。鲁迅疏离这个圈子,那原因也许正在于其中的旧气,这些他是不喜欢的。在上海的时候,到鲁迅寓所去的,大抵非学院派的血性青年,这和苦雨斋形成了对照。或许,由此出发,亦可摸到周氏兄弟失和的另一原因?

不过,苦雨斋的文化视界很广,并非狭隘的小圈子。对外人,亦非排斥的态度。1930年6月12日,胡适造访周宅,晚宴上作陪者系:马隅卿、江绍原、俞平伯、徐耀辰、刘半农、马幼渔、钱玄同等。这里,江绍原与胡适关系较密,对美国文化有相当的了解。苦雨斋的友人,对胡适较为尊重,像钱玄同、沈兼士等,就自认从胡适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众人眼里,他们与胡适,是有许多相通之处的。实际上,周作人与江绍原讨论的问题,大多是西方学术引发的问题,如:性心理、民俗、宗教等,内容并无旧气。而他和钱玄同等人切磋汉字改革方略时,思想是异常解放的。苦雨斋中人,情感方式,带有旧文人的一面,但精神,大抵是新式的,不过有点“为学术而学术”罢了。1928年6月19日,江绍原在上海时,曾写信给周作人,可见他们那时精神的兴奋点:

“启明先生:

尊寄丙寅医学社编辑的周刊一份,已收到。该社有一位姓李的社员,与我认识,故已函伏园,请他用贡献与医学周刊交换。办世界日报的成舍我,似已来上海,报载北大同学会举他和另几个人为代表,呈请大学院勿使北大易名中华大学。周刊作者诸君的几个提议,正是我想提议的。学校中应添医学常识一门功课外,又应编辑一两部通俗的书,为接引一般人之用。又学校中所授的‘医学常识’,似应兼及医学史及旧医学辟谬。日本医学革新的经过,必定极足供我国人参考,我不能从日文书中详考之,真是憾事。今日见清华所出王静安专号,有数文(例如陈寅恪的一篇)似带尊王气息。‘北伐成功了’——据说。北京有无新气象乎?暇时写示一二为祷。上海方面的赵景深、顾均正、徐调孚,均喜研究民间文艺,我颇想怂恿他们组织一个类似民俗学会的团体。已有信去劝进,效果如何,容后报。”^②

江氏的行文,有儒雅之风,而内容,则颇为现代。难怪后来左翼文人抨击苦雨斋时,俞平伯曾出来为之辩护,以为并无没落之态。懂得苦雨斋苦乐的人,在那时并不多。

看周作人日记、书信,以及后人的回忆,觉得苦雨斋确是个特异的存在。周氏周

围的人,在学识上均有不俗之见。马幼渔、钱玄同之于音韵文字,俞平伯之于昆曲、“红学”,废名之于禅宗、六朝文学,张凤举之于日本文化,均为上乘。但他们影响最大的,并非这些。而是1924年11月创办的《语丝》和1930年5月创刊的《骆驼草》。这两本杂志,非学术论苑,而是随笔、小说的园地。众人或于此谈天说地、臧否古今人物,或潜心于创作,周作人、废名的许多随笔,发表于此,影响很大,以致成了“京派”文人的重镇。由一个沙龙而引发出一个文学流派,这对苦雨斋中人而言,是无意形成的吧?

我以为研究现代学术史和文学史,不可不观顾苦雨斋。然而许多年来,这个沙龙的资料甚少,面目模糊。我在翻阅、采访中,偶得到一点线索,便有会心的一笑,觉得可探讨的空间,那么广大。中国读书人的冷热、曲直、忠邪,于此都可感到的。

注:

①《半农杂文·寄周启明》。

②《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354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狂 士

苦雨斋客人中，钱玄同是最特别的一位，他为人坦荡，谈吐不俗，滑稽而豪爽，给周家客厅带来不少的快慰。周作人是个不会幽默的人，他的文章没有笑料，也不逗人，真真有儒家的中正之气。但他偏偏喜欢钱氏，性趣相投，想来也是心灵的代偿吧？一个人缺什么，便需寻些什么，交友之道，互为冷热，取长补短，自古而然。以钱氏之癫狂，周氏之沉稳而言，两人相处无间，那是自然之理。了解苦雨斋，钱玄同的意义不可小视。

钱氏比周作人小2岁，也是浙江人。他与周氏兄弟都在日本留学，师从章太炎，可谓同门弟兄。周作人与鲁迅分手后，钱氏亦疏远了鲁迅，倒和周作人过从很密了。周作人对同代人的学术成就，很少臧否，但对钱玄同，却大加褒奖，认为“五四”之后，最优秀的思想者，惟蔡元培、钱玄同二人而已。其实我读钱氏文章，未觉得如何高明，学问是有的，但文笔不佳，有些粗糙，思想亦难及章太炎、胡适，境界比之前者略逊一筹。人走得很近，反而距离甚远，周作人看人常有偏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曾说钱氏乃“偏执的真人”，这话至今仍然坚信。“五四”时代，骂传统最厉害者，并非鲁迅，钱玄同当为那时斗士者流的第一人。但他的骂人，有时并不高明，出语过直，不修边幅，显得有些莽撞。如1924年12月8日发表于《语丝》第4期的《告遗老》云：

“遗老们！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从桀到洪秀全，他们是怎样的下场？外国由帝国改民国，如法之路易十六，俄之尼古拉斯二世，他们又是怎样下场的？溥仪这样舒舒服服地升为一品大百姓，你们还不满意。难道一定